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选
总主编冯克诚



(第三辑·第二十卷)

[清]戴震
(1724年~1777年)

考据学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编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编版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摇摇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从古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除套分中国卷 五十种、外国卷 五十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一百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摇者

二〇〇九年 源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摇摇篇

戴震考据学思想与教育思想

叔世硕儒——戴震	(员)
摇摇几番科场坎坷 一代朴学大师	(员)
摇摇批判程朱理学 复归儒学原旨	(愿)
生平和教育活动	(员)
戴震思想及产生的时代背景	(圆)
摇摇(一)戴震的思想体系	(圆)
摇摇(二)戴震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圆)
摇摇(三)戴震的思想渊源	(圆)
培养“理民”治安的“贤才”	(猿)
戴震与中国早期启蒙思想	(猿)
摇摇(一)背景	(猿)
摇摇(二)主要观点	(猿)
摇摇(三)意义	(圆)
“由词通道”的经学教育和科技教育思想	(源)
摇摇(一)以经学教育代替理学教育	(源)
摇摇(二)以考据入经 治经在“明道”	(源)
摇摇(三)提倡实用科学 以补宋儒教育之空疏	(源)
扩充学问以“明理解蔽”	(缘)

摇(一)教育的任务是使学生“明理”	(续)
摇(二)人皆有“通天下之理”的“才质”	(续)
摇(三)扩充学问以“尽人之材”	(续)
摇(四)对程朱“复其初”教育思想的抨击	(远)
论道德及道德教育	(远)
摇(一)道德起源于“人伦日用”	(远)
摇(二)“欲”是道德的基础	(远)
摇(三)“平恕去私”是道德的原则	(远)
摇(四)道德的最高标准是“尽其必然”	(远)
戴震考据学派的教育思想	(远)
摇(一)培养“理民”治安的“贤才”	(远)
摇(二)“由词通道”的经学教育和科技教育思想	(远)
摇(三)扩充学问以“明理解蔽”	(远)
摇(四)论道德及道德教育	(远)
戴震教育学说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	(远)

下摇摇篇

戴震教育文论选读

戴震教育语录分类解读	(远)
摇(一)哲学思想	(远)
摇(二)人性论	(远)
摇(三)教育思想	(远)
《戴震文集》教育文论选读	(远)
摇六书论序	(远)
摇原摇摇善	(远)

摇读易系辞论性	(员愿)
摇读孟子论性	(员愿)
摇与是仲明论学书癸酉	(员愿)
摇与姚孝廉姬傅书乙亥	(员愿)
摇与某书	(员愿)
摇与方希原书乙亥	(员愿)
摇孟子字义疏证(节选)	(员愿)
摇性九条	(员愿)
摇才三条	(员愿)
摇绪言(节选)	(员愿)
《孟子字义疏证》教育思想评析	(员愿)
《孟子字义疏证》选读	(员愿)
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员愿)
摇孟子字义疏证卷中·天道	(员愿)
摇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性	(员愿)
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才	(员愿)
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道	(员愿)
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仁义礼智	(员愿)
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诚	(员愿)
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	(员愿)

上摇篇

戴震考据学思想与教育思想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叔世硕儒——戴震

戴震是清代中叶最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主张治学须“志存闻道”、“求之《六经》”,回归儒学原旨,重建儒家“人学”,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几番科场坎坷 一代朴学大师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屯溪市)人。生于清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休宁这个地方向来人文荟萃,商贾云集。戴震的祖上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父亲是一个商人,走南闯北,很见过一些世面。

文献记载戴震大器晚成,五岁时才开始说话。为他作《年谱》的戴门弟子段玉裁解释说“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在这一年,他去拜师读书,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他的记忆力非常出众,能达到“过目成诵”的境界,每天能记诵数千言甚至更多些。这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戴震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盘根问底的学习方法。当时学子都要读《四书》、《五经》。《大学》是《四书》之一,宋代理学家极力表彰,朱熹并作《大学章句》,将《大学》一篇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移易旧文。从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云:“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

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对于朱熹区分经传,虽然有人提出过怀疑,但五百多年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也就相信了朱熹的说法。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有一天塾师讲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戴震问:“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塾师回答说:“此朱文公所说。”又问:“朱文公何时人?”回答说:“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塾师无法解答,只得夸戴震说“此非常儿也。”

的确,戴震小小年纪就敢于怀疑,不盲从,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这对他后来倡导朴学、批判权威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戴震读书,有一种“每一字必求其义”的习惯。塾师授课,讲以下引文凡见于《年谱》者不再注出处,凡见《戴震集》者仅注篇名。解前人的传注训诂,戴震往往不明其义。他不喜欢人云亦云,何况前人传注中往往谬误百出。因此,他要探本溯源,花了三年功夫穷究近代字书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握了其中的精髓。在此基础上,他“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这样,为以后学术、思想更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通训诂“成为戴震及其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治学方法。

《十三经注疏》卷帙浩繁,达数百万言。可 夙岁的戴震已能全举其辞”。他后来对段玉裁说:“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背)诵也。”又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他曾在给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

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在他看来,宋儒重义理而轻文字、音韵、训诂,专尚空虚无用之学,是没有在基本功上用力。他对为学先后的看法、对宋儒的批评虽然定型于晚年,但在 17 岁左右的读书实践中就已经萌芽了。

这以后,戴震随父亲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经商,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同时,他的经学也日有进步。17 岁那年,回到故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青年学者了。戴家小少爷的名字慢慢地被当地的一些名流所知。同邑的程询很喜欢这位还有些稚气的年青人。他说:“载道器也。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他看出这位博学的后生有着过人的才华,擢高第、取显宦,如探囊中之物。但戴震的前程果真能够顺利吗?

离休宁不远的婺源县有一位老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经数十年,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戴震久闻其大名,就拜在他的门下,“取平时所学就正焉”。当时歙县大商人汪梧凤建不速园,广置图书,招揽学者,戴震与同县人郑牧、歙县人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人,与江永皆“诵读讲贯其中”。

在这以后,戴震学术大进,尤其是在筹算、名物、训诂等方面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17 岁时,写成《筹算》(后更名为《策算》)一卷,18 岁撰成《六书论》三卷,19 岁撰成《考工记图注》,20 岁时写成《转语》10 章,到 21 岁左右,撰成《尔雅文字考》十卷。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已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学日进而遇日益穷”,戴震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23 岁时,他被补为休宁县学生。

乾隆十七年(1752 年),戴震 24 岁,进入而立之年。这一年,休宁发生大旱,“斗米千钱”,戴震家中乏食,于是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飧餐,闭户成《屈原赋注》”。当时戴震在学术界虽小有名气,但毕竟还算年轻。因此他又作《屈武音义》,假名汪梧凤。另有《勾股割

圖記》一书,利用西洋算法进行注解,假名吴思孝。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场家族财产纠纷迫使戴震入京避祸。乾隆二十年,戴震状告一个家族中强横子弟侵占祖坟,不料这个强横子弟倚仗财势打通关节,反诬戴震不法,县令准备抓他治罪。戴震闻讯,“乃脱身挟策人都”,只带了一些书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李、衣服都没有。他寄旅于歙县会馆,“是时纪太史陶、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昕、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京师之行,是戴震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鼐、王安国、卢文(弓召)等一大批学术名流都与戴震相识。这些人对戴震的学识都很推赏,为他广为延誉。戴震与这些堪称海内硕儒的人交往,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术上也更为成熟”。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这时为孝廉。他倾心于戴震之学,写信给戴,欲奉其为师。但戴震虽然学高天下,却不好为人师。他回信给姚鼐予以拒绝说:

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因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

作师不如作友,这是戴震的看法。后来姚鼐不满戴震之学,转而大肆批评。此次戴震拒绝为师,使姚鼐免却背师之讥,这是后话。在这封给姚鼐的信中,戴震还谈到了治学方法:

凡仆所以寻求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坟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闻见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

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寻,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

在这里,他提出了治学须有“十分之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余义,这样所得的结论才有坚实的基础。

在京师期间,戴震出入名儒硕彦之门,朝夕讲论。他写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又有《周髀北极(王玄)玠四游解》二篇,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还写了不少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反复阐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此外,他应王安国之邀,到其家塾课其子念孙。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后来蔚为一代考据大师,与戴震的影响分不开。

戴震在京师滞留了两年,声誉鹊起,名扬海内。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还,在扬州结识了惠栋。惠栋是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创者,而戴震则是皖派宗师,二人在学术见解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当然皖派与吴派在治学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这只是清代汉学内部的分歧。章太炎、梁启超都曾对戴、惠之间的差别有所论述。章太炎说:“惠氏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作也。”梁启超以“译言”为喻,说明皖、吴二派之差别:“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机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译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章、梁二人的论述非常确切。

扬州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戴震结识惠栋以后,钱穆认为他的论学宗旨发生一大变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日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戴震在扬州客居达源年之久。

戴震虽然博学多闻,名满海内,但科举之途对他来说却比登天还难了。直到 源岁^①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六次入京参加会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毕竟科举考试所需要的是能够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经学、讲训诂,作出来的八股文未免多了一些学究气,因而不被考官青睐。

从 獯岁到 源岁,戴震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比较重要的有《原善》上中下三篇,《尚书今文古文考》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据段玉裁记载,戴震曾说过:“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又说:“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尚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又说:“《尚书今文古文考》,此篇极认真。”可见戴震对自己这些作品的重视。

戴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该书撰成于乾隆三十一年,戴震 源岁之时。关于他的写作动机,段玉裁是这样说的:

盖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揉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所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

可知戴震此作,是要从根本上抽去宋德性理之学的哲学基础。如果说戴震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一方面是为了打倒理学权威而作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而进行的必要准备,那么《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就标志着戴震哲学体系的形成。

戴震精通舆地之学。在京师期间,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的聘请,纂修《直隶河渠书》^②卷。此书尚未修成,方观承就去世了,接任者对戴震不能礼敬,他于是辞去此事。后来又游山西,修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及《汾阳县志》,“其书之详核,自古地志所未有”。

由于屡试不第,戴震只好南下,主讲浙江金华书院,这一年他已

缘岁了。他从猿岁参加乡试,源岁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十年之间,他汲汲科举,希望能在科场上获得成功。但每次都失望而归。直到乾隆三十八年(员苑苑),戴震的命运才稍稍有些转机。

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乾隆帝)打着“稽古右文”的旗号,命各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第二年,又命儒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钩辑佚书,并开四库馆,准务修纂《四库全书》。四库馆网罗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戴震当时已名重海内,连乾隆帝也风闻过他的大名。这时,纪昀、裘修等人在乾隆面前力荐,于是特召戴震入京,充四库馆纂修官。

戴震进入四库馆后,参加了校订群书的工作。当时由于大量书籍已经散佚,而明代所修《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由此《四库全书》中很大一部分书籍都需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戴震于乾隆三十九年中成《水经注》的校勘工作。他分别经、注,并归纳出三种原则,订正经、注之互伪”。《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较胜各本,又有部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补其缺漏者圆个文字,删其妄增者员个文字,正其进改得猿个文字。该校本颇获乾隆帝的嘉赏,当戴震把它进献给他后,他龙颜大悦,这位爱附庸风雅的皇帝亲撰御诗褒扬说:

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

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

戴震除校勘《水经注》外,还校勘了《九章算术》等古代数学著作。他在四库馆中所校之书还很多。据段玉裁《年谱》,从乾隆三十八年戴震入四库馆,到乾隆四十二年戴震去世,这缘年时间里,他还校勘了《海岛算经》、《仪礼识误》、《周辟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仪礼释宫》、《五曹算经》、《仪礼集释》、《项氏家说》、《蒙需中庸讲义》、《大戴礼》、《方言》等官书,并撰写《提要》。戴展所校官书大体上都是天文、算法、地理、水经、小学、方言、礼制诸书。他的校勘态度非常认真,悉心考订,正伪、补脱、删衍,

力求其实,堪称乾嘉学风的榜样。

即使进入了四库馆,戴震仍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理想目的——考取进士。乾隆四十年,他已经 缘岁^①了,这年秋闭,他去会试,但命运仿佛偏要捉弄这位名重一时的著名学者,他又一次落第。这一回,乾隆皇帝格外开恩,准许他与本年贡士一起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两年以后,戴震在北京去世,一终年 缘岁。

戴震一生著作繁富,涉及学科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策算》)、古文字学(《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古语音学(《转请》)、语言学(《声的考入》声类表孔《方言疏证时》)、考证(《考工记图人《屈原赋注入《诗补传》)、天算(《勾股割口记》)、天文学(《原象》、《迎日推策记》、《续天文略》)、地理学(《校正水经注》、《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经学(《经考》、《尚书义考》)及哲学(《法象论》、《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从他治学的深度和广度来说,不愧为乾、嘉学者之第一人。

批判程朱理学 复归儒学原旨

如果仅仅把戴震看成是一位埋头考据的朴学家,这是对他的最大误解。事实上尽管戴震在经学、小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内达到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深度,但他的最主要的贡献却是哲学上的建树,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乾嘉学者的主要方面。

宋明理学发展到末流,往往空谈心性,束书不观。程朱主张“性即理”,陆王高谈“心即理”,两派的后学者不再去“自家体贴”,各诵先师之言,互相驳难,往往难以论定孰是孰非,逐渐形成了一种“宁道孔孟误,讳说程朱非”的社会风气,儒家原旨晦而不彰。自明代中叶以后,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要解决儒学内部的纷争,必须“取证于经书”,考据之风慢慢形成。经过明清嬗代之巨变,一些学者认识到

空谈足以亡国,因此在考据的基础上,又注意“经世致用”,力图使儒学成为对国家、对百姓有用的学问。他们在自己的学术主张中,或纠程、朱之偏、或矫陆、王之失,对宋明以来的理学思想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希望恢复孔孟儒学的本来面目。戴震的学术思想就是这一时代思潮下的产物。

员教训名物 :明道之具

自宋儒将“道问学”与“尊德性”判为两途,后世儒者专重于“尊德性”,不重视“闻见之知”,舍训诂、名物而空谈义理。宋代学者黄震曾说,本朝经学“摆落训诂,直寻义理”。明代心学独盛,好讲现成“良知”,不需要“工夫”就可以直透“本体”,只要静坐就可以“致良知”。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针对明代学风之流弊,提出“经学即理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戴震继承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学术传统,加以发展,提出“由故训以明义理”、“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把“义理”建立在扎扎实实的考据基础上。

戴震认为,孔孟之道就在《六经》之中。他在《沈学士文集序》中说:

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英之能通。

“圣人之道”在圣人之世虽为人所“共闻习知”,但传之既久,千百年以后,其“名义制度”往往“莫之能通”。因此,他认为“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他解释说:

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借。辨言,则合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

离词、辨言是“闻道”的必由之路。因此,戴震特别推崇“六经尊眼、郑”的惠栋。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他痛心指出,“《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他批评有人区分汉宋,将故训与义理截然判为两途的议论,指出:

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于义。此试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

他反对舍经学而空谈义理，主张贤人、圣人之理义须“求之古经”。但“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还必须“求之故训”。他说：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那么，贤人、圣人之理义在哪里？戴震认为“存乎典章制度者也”。这些“典章制度”不是空虚无物的，而是贤人圣人的大制作，它可以施之于今，经世致用。他批评那些将故训、典章制度和理义截然分开的人说：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

戴震感叹说：“夫今人读书，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有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日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数百年以来，学风日坏，特别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往往流于“凿空”，各家所说的“道”已非儒家的原旨。士生千载之后，求道于典章制度之中，但遗文垂绝，今古县隔，因此，研究古代的训诂、名物就显得特别重要。戴震反复申明这一点。作为他的最基本的学术主张。如在《古经解诂沉序》一文中，他说：

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耳，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诂之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得之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他把小学、文字作为理解“圣贤之心志”的必由之路，正如舍舟揖无以渡江河、舍台阶无以至堂坛一样。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他强调“明道”的工具是踏踏实实的